

1901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四年第二辑

汉口忆旧(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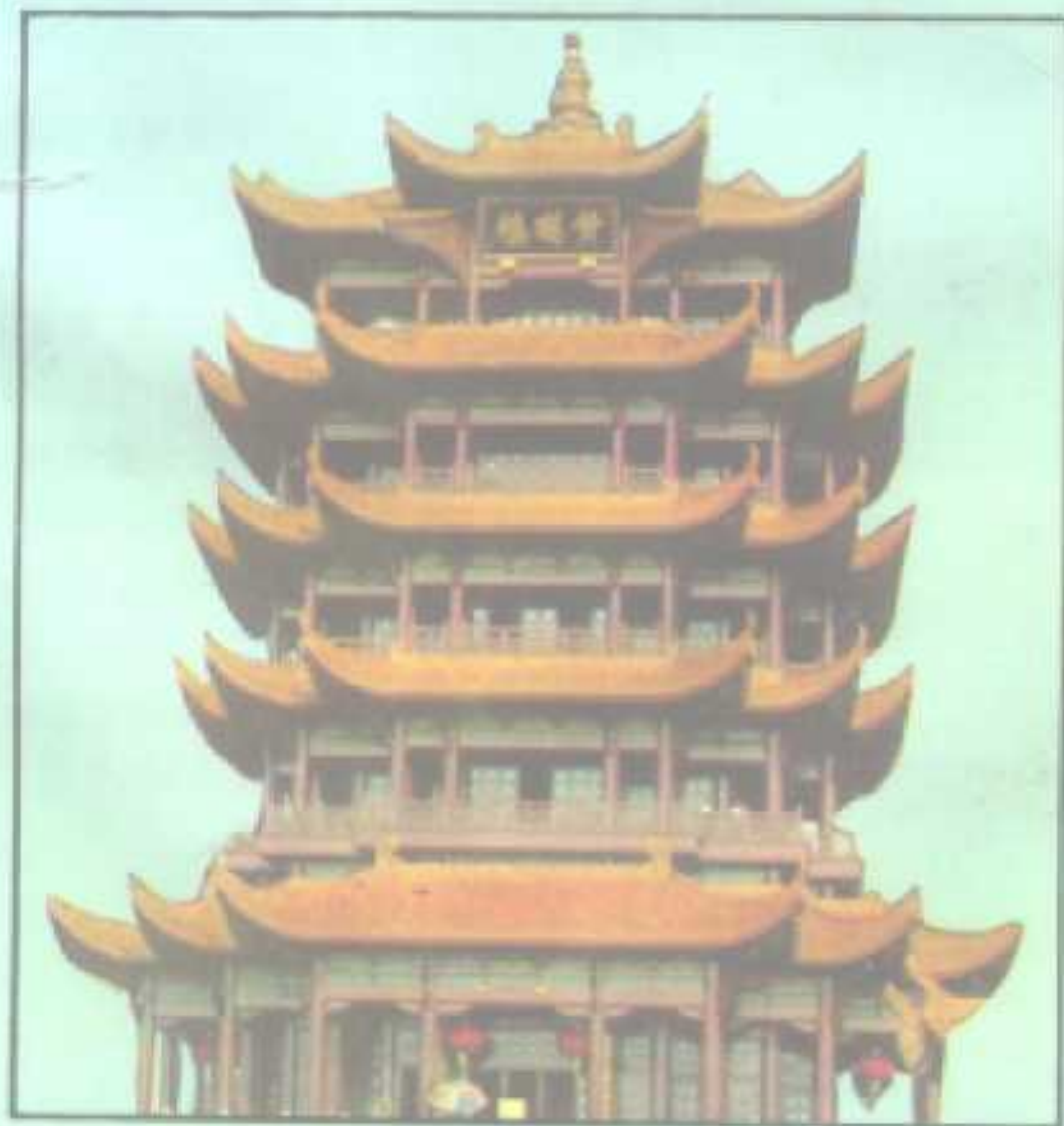
裕大华集团第三任董事长黄师让

旧时汉正街

麒麟门杰出弟子高百岁

汉口的茶园与楚剧

密昌堰与汉口中山大道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编:萧志华
副 主 编:刘通鸾
责任编辑:殷小琴
特约编辑:胡正信
刘章顺
封面设计:王心耀



武汉文史资料 (季刊)

1994 年 6 月出版

出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发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印刷:武汉测绘院地图印刷厂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 01-30 号

定价:3.00 元

主 编 萧志华
副主编 刘通鸾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四年第二辑
总第五十六辑

汉口忆旧（三）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江岸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江汉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硚口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7032/14

武汉文史资料(《汉口忆旧》之三)

人物春秋	裕大华集团第三任董事长黄师让 大藏书家徐行可事略 冼星海抗战救亡二三事 密昌墀与汉口中山大道	丁隆昌(5) 徐考定(14) 刘一曙(20) 张定国(23)
梨园名家	麒门杰出弟子高百岁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 京剧“票友皇后”华香琳	周笑先(27) 杨乃文(32) 万澄中(37)
工商鉴往	怡和布店的兴衰 名扬武汉的曹正兴刀店 经营桐油起家的义瑞行 趣谈“邹紫光阁”的小楷毛笔	张庆珊(41) 曹文显(46) 甘胜录(50) 姚励群(56)
商海钩沉	解放前汉口生漆的对日贸易 汉口生漆业的发展与衰落 三镇市场的变迁 旧汉口猪肉行业杂谈 汉口各行帮业及其贸易 说说汉口的行栈 汉口蛋行史话 洋商蛋厂的演变	江自安(59) 陈斌理(67) 曾昭宏(72) 曾昭宏 魏家莘(76) 王保民(81) 蒋明璧(85) 王治平(88) 璞之(93)

文 化 天 地	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的汉口分支机构	逸 琴(96)
	我所知道的汉口市立图书馆	杨明德(101)
	汉口图书馆史珍闻	李 浩(105)
	木帮大亨——大文堂书局	辛 雯(107)
	汉口沦陷时期的京剧演出	高 质(111)
	旧时汉口街头的伢伢书摊	剑 琴(116)
	具有百年历史的圣教书局	周光亚 舒兴文(118)
	汉口的茶园与楚剧	余文祥(123)
医 药 拾 零	汉口的旧剧场	黄金周(128)
	敦实善堂办学风波始末	董玉梅(133)
	建国前的汉口西医业	胡承运(136)
风 云 岁 月	汉口中英大药房	黄春芳 蔡丹尼(141)
	汉口卫生之最	胡承运(143)
	记汉口仁德医院地下党的工作	宿通权(146)
	抗战初期汉口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万澄中(154)
	提倡国货运动的武汉商会	丁隆昌(157)
宗 教 史 话	汉口培心小学与上海“孩子剧团”	李少农(162)
	抗战前的汉口基督教青年会	梅 川(167)
	汉口佛教正信会的慈善团	张康临(171)

街衢沧桑	旧时汉正街	刘昌浩(173)
	六渡桥桥名及其旧址	沈 思(178)
	硃口的吃喝两条街	于福生(182)
	太平街今昔	王远翔(185)
	新安街与新安市场	崔本胡(188)
	打上殖民印记的渣甸路	蓝毓柱(191)
社会百态	茶馆撷趣	袁素娣(194)
	汉口的关卡	靖 川(197)
	汉口沦陷初期的难民区与法租界	陆 州(200)
	汉口老天桥	杨宣鸿(204)
	旧社会汉口的娼妓	李敬之(206)
日伪时期汉口流通的钞票		程 华(210)
汉口沦陷时期的五首汪伪歌曲		徐明庭(213)
江汉关英人税务司参与夺取关税保管权内幕		甘胜录(217)
质疑订正	也谈汉口外国租界之设立、扩界及收回的时间	袁 玉(221)
	对《汉口租界》各国教堂资料的补充意见	邓恩庆(225)
补白	汉口郝梦麟路	伍文士(19)
	初开堂药局	孙明清(166)
	永宁巷之得名	兰 田(187)

武汉文华室内装饰品有限公司 (227)

后记 (228)

裕大华集团 第三任董事长 黄师让

· 丁隆昌 ·

黄师让,名孝友,四川重庆人,1896年12月8日(清光绪廿二年农历冬月初四日)出生。原籍广东,迁川已有九代。其父黄辅卿,家世贫寒,原在昆明、重庆、上海、广州等处帮天顺祥票号工作20余年。票号结束后,被荐出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襄理兼营业主任。

求学与到楚兴纺织公司工作

黄师让少年在家学习英文5年,15岁离开重庆到武汉求学。1913年春,先后考入文华书院、博文书院所办的中学读书,嗣后到上海考入高级英文商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商科。未及三年,由姐夫苏汰馥介绍,提前离校进入楚兴纺织公司,办理英文事务,兼楚兴纺织学校英文教师,并协助苏汰馥办理楚兴财会工作。

楚兴公司承租湖北纱、布、丝、麻四局,租期10年。黄师让在楚兴工作5年,也是它租期的后5年。这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帝

国主义无暇顾及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外纱进口减少，国棉出口也相应减少，棉花价格下降，因此，刺激了我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仅1919年和1920年，楚兴公司获利达900万银元。引起地方封建势力及军阀集团的排挤。最后还是于1922年底的租期未到时，楚兴公司提前3个月让给了以军阀唐春鹏、石星川为首的“将军团”组成的楚安公司继续承租四局。

楚兴经理徐荣廷等于1919年即已感觉承租期满，恐难继续，开始筹备自办纱厂。楚兴结束后，经过徐等议股投资、选购厂址、兴建厂房、安装机器等一系列工作后，武昌裕华纱厂和石家庄大兴纱厂于1922年先后开工生产，两纱厂的公司均设在汉口。徐荣廷任裕华董事会董事长暨大兴总经理。嗣后大兴亦改行董事长负责制，两公司无论实行何种制度，实权始终掌握在徐荣廷、苏汰馥手中。徐、苏推荐黄师让管理大兴财务，兼办裕华的英文事务，并与银行、钱庄联系，负责用款和贷款工作。

1926年大革命时期，武汉许多富户及企业负责人纷纷离汉。裕华纱厂生产日降，徐荣廷避到上海，苏汰馥回重庆探望父病，由黄师让一度负责裕华公司的全面事务。未久，黄亦赴沪。1927年冬，公司负责人相继回汉，徐荣廷因年老辞去董事长职务，裕华与大兴两公司董事会均推选苏汰馥继任董事长，黄师让被选为常务董事，协助董事长办理日常事务。

主持黄石利华煤矿公司

裕华、大兴成立后数年，生产蒸蒸日上，获利甚厚，积累资金很多，主要股东在公司也存款不少。1931年，正欲增加纱锭扩大生产，适有某钱庄经理詹静哉持黄石利华煤矿的招股章程到徐荣廷家募股，徐允俟武汉大水退后，再前往煤矿查看。是年冬水退，黄师让随徐荣廷、苏汰馥到利华，下井察看煤层，认为有投资价值，当晚决定投资。经双方议定，煤矿仍沿用利华旧名，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司,由裕华、大兴两公司主要股东共投资 120 万元,作为扩大规模和更新设备之用。设董事会及总公司于汉口,推陶公迪任董事长。不久,陶辞职(后任富源煤矿总经理),由苏汰馥任董事长,派黄师让任总经理,常驻汉口总公司。调大兴纱厂工程师程行渐为副总经理,常驻利华煤矿,全面负责技术工作。聘王季良为总工程师,谢任宏为矿师,负责采煤工程。

黄师让与程行渐作了通盘考虑后,认为首先要解决煤矿的交通运输问题。因为从山后矿区到江边,隔着黄荆山这座大山,建筑铁路运输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打穿 3000 公尺的山洞铺设铁路,此工程大,不是轻而易举的;二是绕道阳新县,修筑铁路到江边,但路线长,建筑花费大,运输少数煤,成本不轻。乃请教于铁路方面的工程师,他认为打洞不宜。考虑再三,两者均不能采用。正在犹豫不决之时,安利英洋行汉口分行袁书卿工程师介绍他们看了许多西方国家“挂线运道”的照片,并均有说明。经过几天认真学习。觉得这种运输工具正适宜于煤矿需要,决定采用“挂线运道”。乃与德国一家名厂订约,将矿山的地形作了测量寄去。厂家根据测量设计,一年间交了货,并派一工程师前来指导安装,于 1934 年安装完成。此运道每天工作 20 小时可运煤 1200 吨,还要带回物料及其他物资。“挂线运道”运转数年,从未发生事故。

对于动力问题,采用程行渐的意见,在国外订购 1250KW 透平发电机组一台,置山前;另订购蒸气发电机组两台,一台 400KW 置山前,一台 150KW 置山后矿区,以防紧急需要。

运输、动力及采矿等设备全部完成,约计花费 260 万元,超过了原计划投资 140 万元。徐老信任黄、支持黄,对他说:“钱只管用,一定要完成煤矿的设备,超过之数,由投资股东的存款来支付。”不到 3 年,设备完成,煤矿就开工生产了,日产量高达 800 吨,平均数为 600 吨。

利华煤矿开工生产后,每吨煤的成本为 5 元多,当时市价为每

吨 12 元，甚为稳定。预计每天生产 600 吨，每月获利可达 10 万元。此时，另一煤矿——富源煤矿总经理陶公迪听信其副总经理的建议：“利华煤矿在山后；而富源煤矿在山前，成本比利华轻。如果放价一年把利华杀垮，则将来由我富源独销。”于是武汉煤的市价由每吨 12 元逐步放到每吨 7 元，上海市价由每吨 11 元逐步放到每吨 6 元；并在武汉拉拢几家大煤商不购利华煤；在上海，由富源分销处拉拢几家大煤商拒绝购进利华之煤，垄断手段毒辣。逼得利华在武汉自设分号，将煤直接销售小煤球店；在上海同一家大煤商义太兴订约包销。是此，各煤球店才均卖利华的煤了。同时，利华注重质量，在矿山即把煤的杂质筛尽，上海方面也乐意购用。

1936 年富源亏蚀白银 20 余万两，利华亦无利可图。此时黄师让曾去拜望陶公迪，劝其不应杀价，未取得效果。富源股东纷纷责难，由其董事会出面与苏汰馥董事长协商，要求两矿合作。黄师让建议组织两矿联合销售处，规定生产的数量和相同的价格，恢复原状。得到双方同意，成立联合销售处。于是武汉的煤价恢复到每吨 12 元，上海恢复到每吨 9.3 元。两矿竞争结束。两矿合作未久，抗日战争爆发，江阴封锁，煤不能下运，不得已而减产，直到停产撤退。

抗战胜利后，利华复员。“挂线运道”已被日军拆毁，只得用汽车运输，成本高，产量少，经营极感困难。但有勇气与欧洲捷克厂家联系了“挂线运道”问题，正拟签订合同，因解放战争紧急而搁置下来。

抗战期间裕大华的发展

1938 年武汉沦陷前夕，武昌裕华纱厂和黄石利华煤矿准备撤退到重庆。有一部分股东和少数董事长反对撤退，黄师让是坚决主张撤退的。结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开会，勒令全部撤退，厂方董事会派黄在武汉督促撤退。由于宜昌待运物资堆积如山，裕华的机

器、物资运到宜昌后也无法上运。其棉花在宜昌被日机轰炸,损失数十万元。幸机器设备覆有中立国比利时国旗免遭轰炸。此时苏汰馥董事长正在重庆选择新厂址,黄在武汉撤退前亦已乘机飞川,鉴于宜昌危急情况,向复旦老同学、民生公司轮船部经理杨成质商量,请其协助。杨建议采取互相投资的办法,得到卢作孚与苏汰馥的同意,民生公司乃派出专轮将裕华滞留宜昌的机器、物资运到重庆,得以早日开工生产。

由于武昌裕华纱厂原用的动力是老式的,飞轮太大,没有随机器运走,打算在重庆改用电机发动。黄师让在撤退黄石利华煤矿设备时,曾叮嘱程行渐务必将动力设备妥为装箱撤走,还买下英商电灯公司的发电机两部,一并装运重庆。

在重庆裕华纱厂的机器装好,有动力即可开工时,向电灯公司洽买电力,无法供应。驻厂常务董事张松樵找黄师让协商,要求借用利华煤矿运来的 1250KW 透平发电机。黄考虑再三,不答应则有伤联厂的感情,答应又恐利华将来有煤矿时如何办?而且长期借用,利华股东也是不同意的。只有作价投资。于是大家相商,作价 70 万元,连同其他物资,作为向裕华投资,装置电机的全部工人、技术人员,都转到裕华。以附近山洞作发电厂,未受到敌机轰炸。

在抗战以前,石家庄大兴纱厂积有丰富的资金,拟另设一个分厂,提请董事会研究。黄师让认为华北形势不稳,应另找妥当地方设厂。苏董事长派大兴的副经理徐治平去西安考察。据徐的报告说,西安生产长纤维棉,又无纱厂,如果在西安设厂,原料和销路不成问题,惟产煤地稍远。于是董事会决定在西安兴建纱厂,由大兴和裕华各投资 100 万元,董事会董事投资 50 万元,共 250 万元,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选苏汰馥为董事长。人称“裕大华公司”,即裕华、大兴、大华三厂的简称。

大华公司成立后,向日本订了 3 万纱锭,其中有一万纱锭已运抵连云港。1937 年抗战爆发,华北形势危急,必须从速把连云港的

一万纱锭从陇海铁路运到西安。黄师让推荐派艾衍畴办理此事，取得成功。及时投入了大华纱厂，一二年内获利不少，尤其是生产的纱布供给军用，支援了抗战。1939年10月，西安大华纱厂遭日机轰炸，一面修复开工，一面拨出一部份纱锭，建立四川广元纱厂。

黄师让鉴于裕大华公司在抗战时期事业发展，亟需金融调动，如果本身有个银行就方便得多，而且可以利用银行，吸收游资，扩充裕大华资金。1940年“财政部”有个规定，私人钱庄可以申请改为银行，如超过限期而未申请者，即不再办。于是黄师让向徐、苏、张等建议，得到许可，将其弟黄仲谦经营的重庆永利钱庄申请改组为永利银行。资金100万元，裕大华公司投资过半，其余由董事及私人投资。推苏汰馥为董事长，卢瀚康为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永利银行总行迁到汉口，全国主要商埠设有分行。永利银行为裕大华公司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抗战胜利时，永利银行集中所有资金，在西安抢购了一二万担棉花，使重庆裕华纱厂继续生产。二是武昌裕华纱厂复员时，修理房屋的款项都是永利支持的。

1941年，黄师让等赴西安调查业务，回渝路过成都，见该地是自由市场，纱布不受管制。乃向董事会建议，可利用尚未安装的纱机、布机，以及存在广元的帐外资金一万多担棉花，在成都兴建一个纱厂，可获大利。得到董事会同意，派黄师让以常务董事的身份主办其事。乃从重庆裕华纱厂拨出纱机5000锭、布机100台，利用自有的汽车队力量运往成都设厂。并由黄亲自拜望当地驻军，得到支持。成都纱厂建成投产后，两年获利即等于重庆裕华纱厂的一年利润，以之购买外汇为后来生产作了准备。

抗战胜利后，大华纱厂副经理徐治平向董事会建议，拟设立华年贸易公司，与外国直接通商，免受洋行中间剥削，董事会认可，提议华年公司于1946年在重庆成立，推黄师让为总经理。经营两年业务平稳，惟未做到与国外直接交易。嗣因裕大华公司事务繁忙，黄辞去华年总经理职务，由徐节庵、徐治平先后继任。

解放前后的裕大华董事长

1948年秋,苏汰馥董事长因患心脏病在庐山逝世,董事会选黄师让继任裕大华董事长。由于抗战胜利,裕大华公司准备进行复员工作,需要搞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乃在董事会之下,设总经理一职,聘石凤翔担任,因石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聘张沛霖、徐节庵、苏先勤为副总经理。当时石家庄大兴纱厂被国民党军人占据,是石凤翔去石家庄斡旋,收回了大兴纱厂。重庆芭蕉园存放有裕华纱厂的纱布,市“议会”说是囤积棉纱,由石凤翔与重庆“市长”联系,花了二三万元了结此事。

1947年至1949年,裕大华董事会决定在台湾兴建2万至3万纱锭的大华分厂,委石凤翔为经理。在台湾选购厂址,并运去棉花10000担、布5000匹作为建厂基金,待存放在英国的纱机运到,即可建厂开工。

未久,黄师让听人告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保护的,不要怀疑和恐惧。”从此,黄在思想上有很大转变,认为在台湾设厂一事必须从长考虑。乃召集有关董事张沛霖、徐节庵、苏先勤等商议,黄说:“在台湾设厂是不合条件的,因为棉花要从外地买进,产品要运到外地销售,前途渺茫。裕大华董事会前次决定拟在台湾设厂,是当时大势所趋。现在,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是保护的。我的意见是停止在台湾设厂,存在英国的纱机,待大陆安定后再作安排。大局一定,我们还是要依靠共产党经营事业。”大家都同意黄的意见,请其酌情处理。虽然黄打消了在台湾办厂的想法,但顾虑仍未完全消除。

1947年,石家庄解放,当国民党退出石门时,对工厂大肆轰炸,厂房仓库损失均极惨重,当时主持人逃匿,无人负责。人民政府为了维持工人生活,保护工业基础,遂予接管,并委派霍然为该厂厂长,准备复工。全体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严

寒,积极恢复和修建工厂。不到一月,完全恢复了被炸前的生产状况,使黄的思想产生急剧变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明文公布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黄在重庆又获悉人民政府批准将石家庄大兴纱厂由代管而发还,以及由东济南的私营纺织企业已经开工的消息,喜出望外,受到深刻的教育。因而认识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认识到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坚定了跟党走决心。

此外,抗战胜利时,裕大华公司尚有定购纱机未用完的20万美金,存于上海花旗银行,由黄师让与石凤翔二人可以单签支取。解放后中美失和,美国人完全撤出了中国,花旗银行也撤退回美国,这笔存款也被冻结了。石凤翔去台湾后,一直未与黄通信和见面。当时,裕大华公司尚有几位有代表性的大股东在香港和台湾,石凤翔如有重要行动,可以向他们商议或向裕大华公司提出书面报告,以交代自己的责任。1980年,黄师让参加武汉市赴香港的考察团,曾想趁此机会将这笔美金存款事弄清楚。岂知石凤翔已经去世数年,其妻在台湾,其子在纽约,大股东又都不在香港,以致当时无法清理此事。后经中国人民银行努力,这笔存款于1984年取回。

武汉解放后,裕大华集团所属各企业,除永利银行与华年贸易公司均于解放初期结束外,裕华纱厂、大华纱厂和利华煤矿于1951年申请公私合营,大兴纱厂于1954年与河北省工业厅合营。

裕华纱厂、大华纱厂公私合营后,黄师让等在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思想逐步提高,积极经营管理,1953年,裕大华公司将解放前向英国订购尚未交货的纱机36000锭、布机500台、自动控制浆纱机、大锅炉等全部运回国内,以10000纱锭装于西安大华纱厂,其余则装于武昌与重庆裕华纱厂。又汇回国内港币60万元、美金20万元,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党对民族工商业者作了适当的人事安排。黄师让先后被安排为湖北省工业厅、轻工业厅、轻化工业厅

副厅长,并历任全国工商联执委、顾问,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委,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民建第三届至第六届委员、武汉市工商联第一届监委、第二届监委会召集人、第三届至第五届执委,湖北省工商联名誉副主委。

黄师让 1993 年 7 月因病去世,享年 97 岁。

(江汉区政协供稿)



大藏书家徐行可事略

·徐孝定·

近代湖北著名藏书家先后计有鄂城柯逢时、宜都杨守敬、沔阳卢靖、卢弼、蒲圻张国淦和武汉的徐行可。而其所藏历经战乱保存最久、最完整，且能不吝珍藏出借于人，有助于乡邦文化建设者，唯有徐氏一家。

徐氏藏书册近10万，箱数逾千，其中善本、批、校、抄稿本近万册，时人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诗咏先生，诗云：“家有余财志不纷，宋雕元刻漫云云。自标一帜黄（丕烈）汪（士钟）外，天下英雄独使君”。王謇亦于《续补藏书纪事诗》中咏曰：“又一藏家呈中秘，汉皋佩解即升天，中有文（廷式）柯（逢时）旧藏在，稿刻校抄得天全。”

徐行可先生名恕字行可，号疆谿，以字称，湖北武汉人，生于1890年，幼从黄陂刘凤章先生学。17岁留学日本，次年以弟丧归国，自此之后，学无常师，市书自学，且购且读，寒暑不辍，遂得遍览群籍，探源抉微，悉摒禄仕声利，清以自居，以聚书读书为乐事。自题其书斋曰“箕志堂”、“知论物斋”等，学、行为海内宗仰。

先生博闻强记，智力过人，治学严谨，不轻于立说，以考据、校仇为

徐行可先生（摄于三十年代）



尚。不囿于古。不泥于今，实事求是，兼取诸家之长。有一义未安，必遍察群书，旁征博引，以求正解。故先生所读之书，简端行隙，往往丹黄交错，密行细字，一笔不苟，集征精审，校读至勤。先

生尤精于版本、目录、金石之学，与名士、学者往来论学书简甚繁，多得信赏。写有《诗义申难录序》、《毛诗通度类目》等。所作诗文，为章太炎、黄季刚、高步瀛等先生赞誉，散见于《制言》等杂志